

爱心与教育 素质教育探索手记

我们为什么要办教育

余心言

读了李镇西同志写的教育手记，不由得思考这样的问题：我们为什么要办教育？或者说，孩子们为什么要上学？

不能说过去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。不但是思想家们、教育家们，而且千千万万为人父母者都回答过这样的问题。可惜许多人的回答过于简单。他们认为，上学就是为了读书。为什么要读书？读书是为了升学。升了学还是读书。最后的目的呢？找个好职业，过更好的生活。

于是又有新的问题出来：读好书是不是就一定能达到这样的目的？怎样才算读好书？分数高是不是就一定等于书读得好？

能够教育和受教育，是人类胜过其他生物的一大优势。人生苦短。几十年的实践，加上与生俱来的本能，获得的能力毕竟有限。面对严酷的自然界，实在不足以应付。然而，人还可以通过教育获得前人和他人从实践中得来的知识，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。于是，人就可以一代胜过一代，并且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。短短二三百万年，就从“其异于禽兽也几希”的境地，进步到如今的规模，其前途仍未可限量。

在人类的教育史上，教师作为一种专业出现，最多不过几千年（从孔子至今不足三千年）。这算是一个里程碑。现代学校的出现，不过三四百年。这又是一个里程碑。这两次大的飞跃都极大地加快了人类进步的速度。教师是天下最崇高的职业。教师之功不可没。

说教师的职业最崇高，还因为他们生产的产品是世间最高级的产品——人才。人本身就是宇宙间已知的物质的最高级形态。对这个最高级的物质形态进行加工、雕琢，当然是一种最高级的劳动。人对于人自身的认识又还远远不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从事人的教育，更是一种艰苦的、带探索性的、后果往往难以完全确定的劳动。

为了教育自己的后代，人类在这方面的探索并没有停止过，而且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进展。学校的分类、分级，学科、课程的分设，辅助教学设备以至电化教育设施的运用，实验、作业、考试、实习以及各种有益的教学方法，等等，都是教育科学研究的成果。

正像人类认识的每一个成果，只要向着好像是同一方向多走一小步，真理就会变成谬误。对于教育的领域里许多有用的做法，如果忘记它们只是达到培养人才目的的手段，就完全有可能因为固守这些做法而远离我们的目标。因此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探索更加完善的做法。许多有志的教师正在这样做。李镇西同志的手记反映了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可喜成果。

从李镇西同志的手记里，我们可以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，首先是认清自己的教育活动的目标，不是一张张的成绩单，不是一堆分数，不是高一级学校的录取通知，而是活生生的人，是人才，是能够在未来社会中站住脚跟，开创事业的人才。这样的人才，不仅要在学校里读书，通过读书获得一定的扎实的知识，更需要终身有读书的兴趣，求知的欲望，并且有能力自己学习，有能力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知识，有能力吸取这些知识。这样的人才还要能够正确地处理社会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，经历顺利和艰难、成功和挫折的考验。他们需要有知识，更需要有理想，有坚强的意志，有优良的品质。这一

一切都是需要在学校中奠定基础的。李镇西同志认为，这正是自己的职责。

其次，使我们强烈感受的是李镇西同志对学生的一腔爱心。这是所有成功教师的共同经验。爱孩子才能培育孩子的爱心。爱孩子才能无微不至地关心、注视他们成长中的每一个细节，才能为他们的每一点微小进步而衷心喜悦，才能感知他们的苦恼和困惑，并且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费尽自己的心血。爱孩子，才能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坚持不懈地写下那么多手记、札记，为进一步探索教育的规律积累那么多原始的宝贵的资料。

李镇西同志对待学生的平等态度，可能是他的这本手记中最有特色的部分。他是学生的老师，更是学生的朋友，而且是知心的朋友。正因为 he 知学生们的心，他就赢得了教育引导的主动权，同时也赢得了学生对他的尊重。在他和学生之间，我们看不见有什么“代沟”。有的人用“孩子王”的说法来贬低教师。其实，要做孩子们认可的“王”，真是谈何容易！

人的成长过程，变数实在太多，因此更需要有众多的有心人用心地探索、研究。李镇西同志的这本手记，就是他的“心灵写诗”。他是把自己一颗火红的心投入到这个美好的事业中的。在这个世纪之交，中华民族振兴、腾飞急切地要求全民族素质提高的时候，出版他的手记，相信会受到许多教师的欢迎，也会受到许多家长的欢迎。同时我还相信，一定还有许多李镇西的同行们，也有他们的札记、手记。

我们期待有更多这样的作品出版。

1998年5月

（本之作者，原名徐惟诚，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，现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。）

引言：高扬民主、科学、个性的教育旗帜

——我的教育思想历程

世纪之交的中国基础教育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，当首推“素质教育”。

对于素质教育，已经有许多专家提出了不少精辟深刻、令人折服的见解。我是长期在基础教育第一线从事教育的实际工作者，因而不具备宏观的、高层次的理论思维，但十多年鲜活的校园生活使我对素质教育不但全身心地拥护，而且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

“素质教育”的大旗上，有一个大写的“人”字：它是目中有“人”的教育，是充满人性、人情和人道的教育，是为了一切人全面发展的教育！

我的这个理解，不是纯理论思考的结果，而是十几年教育实践赋予我的思想结晶。

不知我这样说是否有拔高自己之嫌：刚参加教育工作时，我有一种真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当然来自我少年时代所受的关于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教育，但更来源于我对当时社会风气的深深忧虑。

记得当时就有同事对我调侃道：“你把胡耀邦该操的心都操了！”

是的，现在想起来，那时我的“庄严”与“神圣”的确有些幼稚，但我那颗真诚的责任心（后来成了我的事业心），至今未曾褪色！

就理论素养而言，我当时堪称“一贫如洗”。我只是凭着一腔热情便“赤膊上阵”了：一天十几个小时和学生“泡”在一起，真正成了“娃娃头”！

开始对教育进行一些肤浅的理论思考，是在我出手“教训”欺负我班学生的学生之后的反思。

正是在那时，我第一次读到了苏霍姆林斯基的《要相信孩子》，这本定价三角六分钱的薄薄的小册子，成了我教育理论真正的启蒙读物，我也从此成了苏霍姆林斯基的“追星族”一员。

苏霍姆林斯基在我教育生活中的出现，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我对打学生这种错误行为的自我教育。更重要的是，对比当时的教育现实和我自己的教育状况，我第一次站在了“人”的高度来关注教育。

从教育现实来说，当时的“应试教育”显然远不及现在，但也端倪渐显，并已引起有识之士及社会各界的忧虑（当时对这一弊端的概括叫做“片面追求升学率”）。教育已经明显开始畸形发展——在不少教育者眼中，学生的大脑就是装分数的容器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学生的思想教育、能力发展以及综合素质的培养显然是远远不够的。

从我当时的教育状况来看，虽然我对学生充满了教育热情，但基本上是把学生仅仅当做被动接受教育的客体，而未把他们看做有自己独特心灵世界、有充分主体意识的人；在我的眼中，学生是作为共性存在的教育对象，而不是一个个独具个性的人。另外，当时我虽然也注重了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美劳几方面的教育培养，但这些教育只是孤立的“德育”、“智育”、“体育”等等，而没有意识到任何有效的教育都是互相交融渗透的。

苏霍姆林斯基一系列精辟而又通俗的论述，一下子就深深地吸引了我——

他认为，我们的教育对象的心灵绝不是一块不毛之地，而是一片已经生长着美好思想道德萌芽的肥沃的田地，因此，教师的责任首先在于发现并扶

正学生心灵土壤中的每一株幼苗，让它不断壮大，最后排挤掉自己缺点的杂草。

他提出，教育者的使命，就是让孩子各方面和谐地发展；这种和谐发展的前提是对每一个学生个性的尊重：“和谐的教育——这就是发现深藏在每一个人内心的财富。共产主义教育的明智，就在于使每一个人在他的天赋所及的一切领域中最充分地表现自己。”

他还十分注重“集体”这个有力的教育工具，特别强调集体中“共性”与“个性”的辩证统一。他一方面指出，“集体是在共同的思想、共同的智力、共同的情感、共同的组织这几个基石上建立起来的”；另一方面又指出，“如果学生没有个性，那就不会有集体”。

.....

要想用三言两语概括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观点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但我认为，他全部理论的基石无非就是一个朴素而富有 人情味的愿望：把每一个学生培养成幸福的人！他说，教学大纲、教科书规定了给予学生的各种知识，但是没有规定给予学生最重要的一样东西，这就是：幸福。他的教育信念就是：“要培养真正的人！”让每一个从他手里培养出来的人都能幸福地度过自己的一生，这就是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理想。

苏霍姆林斯基的观点是那樣的通俗，语言是那樣的亲切，连书名也充满了“人”的魅力：《要相信孩子》、《我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》、《关于人的思考》、《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》、《让少年一代健康成长》、《怎样培养真正的人》.....

可以说，苏霍姆林斯基的思想，是在我教育生涯的早晨投下的 第一缕金色的霞光。

值得顺便一提的是，苏霍姆林斯基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早晨五点钟就起来写《教育日记》的精神和做法，也深深影响了我。从那以后直到现在，我也一直坚持写《教育日记》、《教育手记》和《教育随笔》。

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“未来班”，是我第一次有意识的比较系统全面的教育实验。其具体做法，在我另外一本书里将有详尽描述。在这里我只想强调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“未来班”的教育实践是成功的，其标志固然是它符合了许多通常教育评价的“硬指标”；但在我的心目中，得意之点主要在于：我自觉地发挥了“集体”的教育功能，注意了各种教育内容和方式的有机融合，善于引导学生自我教育，开始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及其精神世界的充实，有意调动学校以外的积极因素参与教育.....

更重要的是，“未来班”为学生的班级生活和我的教育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：学生通过生机勃勃的集体生活，切身体验到了成长的乐趣、发展的乐趣、创造的乐趣，他们拥有了自己充实而美好的精神世界；我通过学生的幸福体会到了自己的幸福，通过对“未来班”的创意、建设和发展体会到了教育科研的意义和教育艺术的魅力所在。

我当然不能像“事后诸葛亮”似地夸耀自己如何如何在十几年前就在搞“素质教育”了，但是，我最初的教育探索的目的，就在于试图纠正当时“片面追求升学率”这种教育中存在的弊端，而且也部分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。

然而，“未来班”教育模式的缺陷也是明显的。虽然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一点，但继续向前推进的教育探索，便逐步显示了“未来班”教育的缺陷，这就是：重继承，轻创新。

我是在对“宁小燕”自杀事件的剖析（参见本书《沉重的思考》）过程中，逐步意识到自己的教育缺陷的：革命传统教育永远是需要，革命理想主义、英雄主义教育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德育永远不可缺少的，但是，面对变化了的社会和日益发展的时代，如果我们的教育不及时更新内容，那就必然会被社会和时代所抛弃；而且，如果我们的教育只是“玫瑰色教育”，那么，所培养的学生一旦走上社会必然会碰壁。

“未来班”在具体的教育方式、手段和技巧上，无疑有许多创新，但其教育内容或者说贯穿其中的教育灵魂，却仅仅是力图继承恢复我国五六十年代的道德风尚。在“未来班”，我和我的学生也的确营造出了《青春万岁》中那样一种纯真温馨的集体舆论和班级氛围；但是，我所培养的“郑波”们、“杨蔷云”们（郑波、杨蔷云均系《青春万岁》的主人公），从我这儿出去后，面对迥异于五六十年代风气的社会现实，肯定会产生“宁小燕”式的迷茫。这对我的教育来说，无疑是一种尴尬！

而当时日益汹涌的改革大潮，无疑呼唤着一种既深入学生心灵又真正面向未来的教育。一方面，面对日趋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紧张的生活节奏，学生的青春期心理疾病渐渐增多，需要教育者深入每一个学生的心灵，而过去我们的教育除了“政治思想工作”，几乎没有真正的心理辅导和心理保健。同时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（当时的提法是“社会主义商品经济”）的发展，必然唤醒人们的主体意识，并期待着对公民的独立人格、法治观念和民主精神的培养成为我们教育的应有内容。另外，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价值观念、效益观念、竞争观念、信息观念、人才观念、创新意识、平等意识、守信意识、自立意识、破釜沉舟的冒险精神、越挫越勇的进取精神、机动灵活的应变能力、明察秋毫的预见能力以及人际关系处世艺术等等，这些都是我们传统德育所缺乏或比较薄弱的。

1983年邓小平同志关于“教育要面向现代化，面向世界，面向未来”的题词，无疑是中国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、由封闭走向开放的第一声春雷；而1985年《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》则掀起了中国教育改革的第一页壮丽诗篇。万里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更是给我以强烈的心灵撞击：“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，多出人才、出好人才。什么叫‘好人才’？一句话，就是新时代需要的人才。……这个新时代需要的人才，应该是有理想、有文化、有道德、有纪律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，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，应该不断追求新知，具有实事求是、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。这样的人才，才能真正成为新时代的主人和人民的公仆。这样的人才，当然具有独立思考、勇于探索、勇于创新的精神和民主的作风。如果缺乏这种时代精神和新的品质，没有理想、没有纪律、没有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，不管有多少知识，也不能算新时代需要的人才。”在这篇讲话中，万里同志尖锐地抨击了传统教育的弊端：“我国陈腐的传统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，可以说是一种封闭型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。教育内容是固定的、僵化的，教育的任务就是灌输这些内容，不能稍加发挥，不能问个为什么，更不能怀疑，考试按固定的内容和格式照答就行，把学生引导到追求高分上去。这种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培养出来的人才，只能是唯书、唯上，必然缺乏创造性和进取精神。历史上，凡是对人民做出较大贡献的政治家、思想家，都是或多或少地突破这种教育思想的结果。……我们现在要取得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，就应该改革

陈腐的传统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，大大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，敢于创新的精神。”

这一时期，我发表了一系列教育反思的文章：《商品经济的德育思考》、《中学德育危机原因初探》、《从理想的天空到现实的大地》、《正视历史的进步》、《回答学生关心的问题》、《德育的困惑》、《关于改进爱国主义教育的思考》、《德育观念的十大碰撞》……

以现在的眼光看，发表于1987年到1990年期间的这一系列文章，观点也许偏激，认识也许片面，论述也许肤浅，但是，其中对教育现状的忧虑是真诚的，对教育弊端的思考是严肃的，对教育改革的期待是热切的。

当然不仅仅是忧虑、思考和期待，我也在实践中充实我的教育内容并改进教育方法——

我将学生青春期心理辅导纳入教育内容，系统地开展了学生青春期心理教育。通过专题讲座、个别谈心、书信交流等形式，真正走进学生心灵，对他们进行富有个性化的引导和培养。我写下的近二十万字的学生心理咨询通信和青春期教育论文，是我对这一教育探索的结晶。

我继续进行班级集体主义教育的研究和实践。与过去不同的是，我在注重发挥“集体”对个人的教育功能的同时，更注重集体中个性的正常发展，使“集体”成为个性发展的健康摇篮，成为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有效载体。同时，我还对集体主义教育中压抑个性、依赖教师、追求虚荣等“假集体主义倾向”进行了研究和剖析。1990年全年的《河南教育》特意为我开辟了“集体主义教育漫话”专栏，发表了我一系列的相关论文。

在班级管理上，我进行了“用‘法治’取代‘人治’”的探索。我大胆破除传统班级管理中的“人治”思想，采用体现民主观念和法治精神的班级“法规”对班级实行“法治”管理。我的这一探索被《中国青年报》、《天津教育》披露后，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。《天津教育》为此还专门展开了讨论和争鸣。虽然我的这一探索不是完美无缺的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有许多值得商榷和改进的地方，但我所遵循的基本精神——让班级管理更加科学、更加民主，则已成为我坚定不移的信念。

另外，在学生创造性思维和能力的培养方面，在语文教学民主化的摸索方面，在教育个性化的尝试方面，在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关系的研究与实践方面……我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。

我开始被邀请到省内各地各学校讲学，后来又应邀到天津、河南、安徽、湖北、江西等省市汇报交流我的教育改革体会。我在宣传自己教育主张的同时，又得到了许多教育同行及专家的指导。

决不人云亦云，做一个勇于独立思考的教育者；决不因循守旧，做一个善于创新的教育者——是我那一时期教育的自觉追求。

1991年初，我从乐山一中调到成都玉林中学，虽然仍然是当班主任和从事语文教学，但从以后的发展来看，这次调动是我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转折。

由于正式调动不很顺利，我在成都过了两年“单身汉”的日子，我因此而有更多的业余时间读书、思考和写作。

我重新读了我书架上的苏霍姆林斯基的所有著作；同时，第一次完整地通读了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和《庄子》；读了《外国教育史》、《人格心理学导论》；还读了一些与教育没有直接联系的书，如《马克思主义原理》、《中国思想史论》、《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》等等。我试图从更深远的中外

教育发展史和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来思考教育，并从更多的科学理论中汲取教育养料。在这一时期所读的书中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陶行知和叶圣陶的著作。我以前只是“语录”式地接触过这两位教育家的一些观点，现在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《陶行知文集》和《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》。说实话，我的阅读远远谈不上是精读，还只是浮光掠影的浏览，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被两位教育家博大精深而又富于中国气派的教育思想所震撼。联系我以前读过的苏霍姆林斯基，我不禁感叹：这几位教育大师的思想与我们今天的教育现实实在是太贴近了！他们所言所论，就仿佛是针对今天中国教育的弊端而发出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现在津津乐道的一些教改“新观念”，早在几十年前或更早，就被这几位教育家提出来了！

我以这些理论思考总结我的教育实践，完成了两本专著的写作：一本是《青春期悄悄话——致中学生朋友的100封信》（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），一本是与人合写的《班主任工作指导》（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）；另外，还在《中国青年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中国教育报》等十几家报刊发表了近百篇教育文章。

在教育实践方面，我进一步加强了对学生进行个性教育、民主教育和生活教育的研究和尝试。所谓“个性教育”，就是尊重学生个性、发展学生个性的教育，其核心是学生创造精神的培养。所谓“民主教育”，就是学生独立人格、平等意识、法治（注意：包括“法制”，但不仅仅是“法制”）精神等现代观念的教育。所谓“生活教育”，就是教会学生把书本知识转化为生活能力，把学校教育与日常生活沟通，把时代的活水引入课堂，把教育的空间扩展到社会的天地。

我在进行这些探索的时候，脑子里当然没有“素质教育”的概念，但对苏霍姆林斯基、陶行知、叶圣陶等教育家的理论学习和我自己多年的教育实践的回顾，使我形成了一个质朴的认识：教育的根本目的，是着眼于每一个“人”的发展，而不是培养“考试机器”；因此，唯分数至上的所谓“教育”，是目中无“人”的伪教育！

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很质朴的认识，我开始对越演越烈的“升学教育”（这是我当时的概括）进行无情的抨击。在一篇题为《教育的魅力在于个性》的文章中，我这样写道——

常说“不以成败论英雄”，但这话在中国似乎从来就未真正做到过。就目前中学教育而言，“成”的标志，从理论上讲，是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；但事实上，“成”的惟一标志只是学生们的升学分数以及学校的升学率。这使许多有志于教育改革的人，虽然胸怀教育科学与教育民主的顽强信念，却不得不在“升学教育”的铁索桥上冒着“学生考不上大学一切都是白搭”的舆论“弹雨”，艰难而又执着地前行！

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教育评价：假如某位班主任的工作富有特色（比如班级管理尽可能交给学生，平时尽可能开展各种有益于学生全面发展的活动等等），尽管在当时就可以判断出这些做法是符合教育规律的，但周围舆论仍然会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几年后的高考：“工作倒是蛮有新意的，可万一高考滑坡怎么办？”“哼！就会搞一些花花哨哨的东西，到时候高考可有好戏看了！”……几年后，假若学生高考成绩不错，人们会齐声喝彩：“你看，人家的班级管理那么放手，而且又搞了那么多的班级教育活动，高考成绩仍然这么好，他确实有两下子！”相反，若高考成绩不理想或低于人们的期望值，同样的人也许会说：“班级管理那么松散，还搞了那么多与高考无关的活动，高考当然会砸锅——我早就料到了！”

于是，在当代中国，几乎任何一位“优秀教师”“优秀事迹”的辉煌大厦，都必须以其班级大大高于所在年级、所在地区平均水平的“升学率”作为支撑的主要栋梁，否则，他的一切教育思考、探索与创新都等于零！

不能简单说这种社会评价舆论完全不合理。因为在中国这个人口压力极大的国度，升学是人们今后就业竞争乃至生存竞争的最关键也最重要的途径；而且，使学生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，也是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。但这毕竟不是惟一的目标！特别是在“升学教育”压倒一切时，不但“做人第一”、“全面发展”、“发展个性”等教育要义成了点缀的口号，而取得较高升学率所付出的代价，往往是学生个性精神的丧失！没有个性的教育必然培养出没有个性的学生——缺乏心灵自由，丧失主体人格，不会独立思考，毫无创造精神！长此下去，我们的民族是很难真正屹立于世界强盛民族之林的。

马克思常用“人的解放”来说明共产主义革命的最终目的。时代发展到今天，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：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没有“教育的解放”，就谈不上“人的解放”！——正在告别20世纪走向新世纪、渴望现代化、渴望在世界上彻底扬眉吐气的社会主义中国，尤其呼唤这种“解放”！

……

正是因为我（其实，决不仅仅是我一个人）多年来就有着这样一种热切的呼唤，所以当我第一次读到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》中“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到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上来”时，当我听到李岚清副总理提出“基础教育要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”时，是多么的欣喜、多么的激动！

时至今日，还有人“对‘素质教育’的概念提出质疑，甚至还有人‘对柳斌同志概括的‘素质教育三要义’（即‘面向全体学生’、‘让学生全面发展’、‘让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发展’）嗤之以鼻，认为‘搞了半天，素质教育就是这么个玩意儿’”。但是，素质教育所体现的一些基本思想：“教育学生学会做人”、“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主要是通过为每个人的个性发展服务来实现的”、“中学阶段德育要培养学生三个意识：一个公民意识，一个爱国意识，还有一个民主意识”、“要注重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培养”、“教育多样性、培养目标多样化”等等，则充分表明，素质教育真正是把学生当做“人”的教育！

回顾以往读过的教育理论书籍，我感到，“素质教育”的概念虽然是近几年才提出的，但我从许多前辈教育大家的著作中，都读到了不少体现素质教育精神的精辟论述，特别是陶行知的“生活教育”和苏霍姆林斯基的“和谐教育”，对我们今天的素质教育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。陶行知说：“我们此地的教育，是生活的教育，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，不是作假的教育。人生需要什么，我们就教什么。”他明确指出，生活教育的“四大方针，即民主的、大众的、科学的、进步的方针”。他还大声疾呼，要“解放儿童的创造力”，“解放小孩子的双手，解放小孩子的嘴，解放小孩子的空间，解放小孩子的时间”。苏霍姆林斯基说：“所谓和谐的教育，就是如何把人的活动的两种职能配合起来，使两者得到平衡：一种职能就是认识和理解客观世界，另一种职能就是人的自我表现，自己的内在本质的表现，自己的世界观、观点、信念、意志力、性格在积极的劳动中和创造中，以及在集体成员的相互关系中的表现和显示。正是在这一点上，即在人的表现上，应当加以深刻的思考，并且朝着这个方向改革教育工作。”苏霍姆林斯基还以诗一般美好的语言描述道：“共产主义教育的英明和真正的人道精神就在于：要在每一

个人(毫无例外地是每一个人)的身上发现他那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劳动的源泉,帮助每一个人打开眼界看到自己,使他看见、理解和感觉到自己身上的人类自豪感的火花,从而成为一个精神上坚强的人,成为维护自己尊严的不可战胜的战士。……人的充分的表现,这既是社会的幸福,也是个人的幸福。”

在重新学习陶行知教育思想时,先生有一段话特别震撼我的心灵:

“要想完成乡村教育的使命,属于什么计划方法都是次要的,那超过一切的条件是同志们肯不肯把整个的心献给乡村人民和儿童。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。惟独从心里发出来的,才能打到心的深处。”

读着这段话,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今天的素质教育。说到“素质教育”,不少教育者往往更多的是把眼光投向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、教学设备、考试制度等等的改革,这些当然是必要的,但是我认为,素质教育决不仅仅是教育技术层面的事,它首先是一种充满情感的教育,是充分体现教育者爱心与童心的教育,是“心心相印的活动”。

离开了情感,一切教育都无从谈起。当年陶行知所提倡的“乡村教育”是这样,今天我们所呼唤的“素质教育”也是如此。

素质教育的提出,一下照亮了我十几年教育实践中潜在而朦胧的思想萌芽,我进而提出了我的“素质教育观”——素质教育是“民主、科学、个性”的教育!它是“民主”的教育:把学生当成有灵性的人,而非“学习机器”;发自肺腑地爱每一位学生而不仅仅是少数“尖子生”;教师把自己视为与学生在人格、尊严和情感上平等的朋友和探求真理道路上志同道合的同志。它是“科学”的教育:严格遵循教育自身的规律,而不是硬套经济规律,以致把学校办成工厂,把学生当成商品;同时更要符合学生心理的实际和他们的认识发展规律,把教育学生的过程还原为学生自我教育的过程。它是“个性”的教育:尊重学生在性格、情感、思想等方面的独特性,特别应尊重学生的精神世界;要求教育者摒弃“应试教育”中的“一刀切”,真正做到“一把钥匙开一把锁”;尊重学生的个性,还意味着不用升学与否来衡量学生是否成才,而是尊重学生未来的发展,坚信每一个学生都会在今后的社会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

以“民主、科学、个性”为主题,我写了两篇文章:《语文素质教育的思考与实践》、《教育呼唤民主、科学与个性》。前者是谈语文教学改革的,发表在《中学语文教学》杂志;后者是谈班主任工作改革的,发表在《中国教育报》。同时,我又在四川《华西都市报》上发表了一组谈“素质教育”的系列文章。这些文章发表后,均收到良好的社会反响。

1997年9月,我来到具有悠久办学历史和优良文化传统的“中华名校”成都石室中学任教,又开始了素质教育新的探索……

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新的世纪已曙光初露,素质教育尚任重道远。我个人的力量也许是微不足道的,但我仍然希望通过自己坚韧执着的探索,顽强地证明——

尽管也许还会有碰撞,但素质教育这只世纪鲲鹏,毕竟已经顽强地起飞了!

我把一篇题为《素质教育:在碰撞中顽强起飞》的文章的最后一句话,移植过来作为这篇“思想历程”的结尾,是想表达一个同样顽强的信念:“素

质教育”的旗帜终将在中国的每一座校园的上空猎猎飘扬！

我谨以这本《探索手记》，献给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教育，并为世纪之交的中国留下一页“素质教育备忘录”。

1998 年 1 月 8 日

爱心与教育

素质教育，首先是充满感情的教育。一个受孩子衷心爱戴的老师，一定是一位最富有人情味的人。只有童心能够唤醒爱心，只有爱心能够滋润童心。离开了情感，一切教育都无从谈起。

手记一：爱心和童心 ——我和学生的感情故事

关于爱心和童心的随想

常常有人问我：“当个好老师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？”

我总是不假思索地这样回答：“拥有一颗爱学生的心！”

已有不少有识之士指出，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高素质的教师队伍。不过，按我的理解，这“高素质”的第一条应该是乐于像苏霍姆林斯基那样“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”。

这当然早已不是什么“新潮观点”。从孔子的“爱之，能勿劳乎？忠之，能勿悔乎？”到夏丏尊的“没有爱就没有教育”，从罗素“凡是教师缺乏爱的地方，无论品格还是智慧都不能充分地或者自由地得到发展”到苏霍姆林斯基的“我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”……古今中外的教育家们教育思想有所不同，教育风格各有千秋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，那就是“爱的教育”。

素质教育，首先是充满感情的教育。

一个真诚的教育者必定是一位真诚的人道主义者。

一个受孩子衷心爱戴的老师，一定是一位最富有人情味的人。

只有童心能够唤醒爱心，只有爱心能够滋润童心。

离开了情感，一切教育都无从谈起。

但这种情感，不是装模作样的“平易近人”，也不是教师对学生居高临下的“感情恩赐”，甚至不是为了达到某种教育目的而采取的“感情投资”（我对这种充满商业气息的说法向来十分反感），而是朋友般平等而真诚的感情。

感情当然不能取代教育，但教育必须充满感情，然而，有时候师生之间相互的感情并不一定有着明显的直接的“教育功利”目的。如果师生间建立起了感情的良性循环——教师经常想：“这么好的学生，我怎么能想方设法地把他们教好呢？”学生经常想：“这么好的老师，我怎么能不好好听从他的教育呢？”——那么，我们的教育便现出了成功的曙光！

爱学生，就必须善于走进学生的情感世界。而要走进学生的情感世界，就必须首先把自己当做学生的朋友，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。“每个孩子都引起我的兴趣，总想知道，他的主要精力倾注在什么上面，他最关心和最感兴趣的是什么，他有哪些快乐和痛苦等等。我的小朋友圈子一天天扩大，并且像我以后才意识到的那样，连我不曾教过课的那些孩子也成了我的朋友和受我教育的了。”——当我第一次读到苏霍姆林斯基这段真诚的话时，我竟感动得眼睛都湿润了：一个享誉全球的大教育家竟然有这样一颗爱孩子的童心！还是这位我敬重的教育家，曾在一个春天，和他的学生们共同买了一条小木船，然后划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上去探险。教育家写道：“可能有人会想，作者想借这些事例来炫耀自己特别关心孩子。不对，买船是出于我想给孩子们带来快乐，而孩子们的快乐，对于我就是最大的幸福。”（苏霍姆林斯基：《巴甫雷什中学》）

教师对学生真挚的爱是我们感染学生的情感魅力。有些教师总喜欢在学生面前表现出“高深莫测”、“凛然不可侵犯”的“派头”，从中体验着自

己的“尊严”。其实，这不是尊严，只是威严。真正的尊严是敬重而非敬畏。师生在人格上应是绝对平等的，教师不应自视比学生“高人一等”。因此，我们对学生的爱，不应是居高临下的“平易近人”，而应是发自肺腑的对朋友的爱。这种爱的表达既是无微不至的，又是不由自主的：上课时面对学生的问候，我们不是礼节性地点点头，而是充满真诚感激之情深深地鞠躬；气温骤降，我们感到寒冷时，急切地提醒学生“多穿一件衣服”；学生生日到了，班主任笑咪咪地送上一张贺卡；节假日，邀约学生（或被学生邀约）去远足郊游、去登山探险；在课余，与学生一起评论甚至争论一下北约东扩的影响、中东和平的前景或马拉多纳或郝海东……当我们把爱心自然而然地献给学生时，学生会不仅把我们当做老师。这时我们获得的尊严，就不仅仅是教师的尊严，更有朋友的尊严、同志的尊严、兄长的尊严、父亲的尊严。

教师真正的尊严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并不是我们个人的主观感受，而是学生对我们的道德肯定、知识折服和感情依恋。当我们故作尊严，甚至以牺牲学生的尊严来换取自己的尊严时，学生根本不会买我们的账，只会向我们投来冷漠的眼光；当我们“无视”自己的尊严，而努力追求高尚的品德、出色的教育、真诚的感情，并随时注意维护、尊重学生的尊严时，学生会把他们全部的爱心和敬意奉献给我们。这样，我们便把自己尊严的丰碑建在了学生的心中！由此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朴素的真理——

教育者的尊严是学生给的！

本来，从某种角度看，我其实是很不适宜于当老师的，因为我性子太急躁，常常忍不住就发火甚至对学生态度粗暴，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我当老师又有着自己的可能是独特的优势，这就是我很爱孩子，或者说我的性格里面本身就有许多“孩子气”。就教育技巧或者说教育艺术而言，我有许多致命的弱点，因而在我的教育历程中，有过不少至今想起来还令我脸红的失误，但是，只有一点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：我有一颗童心！

这颗童心，使我深深地爱着我的每一届学生、每一位学生；这颗童心，使我的学生原谅了我对他们有时抑制不住的暴怒；这颗童心，不止一次使我和学生一起欢笑，一起流泪；这颗童心，使我自然而然地走进了学生的情感世界，也让我的学生常常不知不觉地拨动了我的情弦……

爱心和童心，是我教育事业永不言败的最后一道防线。

情洒童心

刚参加工作那几年，出于爱孩子的天性，我几乎整天都和比我小不了多少的学生泡在一起，因此，学生们喜欢我，他们的家长也很感动。

我首先得到的关怀，来自学生们的家长。

汪斌同学的父亲来学校看我，见我的单身宿舍里除了书桌、书架和床以外，唯一的炊具便是一个煤油炉子，他便对我说：“李老师，您可要注意身体啊！要学会照顾自己，尤其是要加强营养。”他第二次来的时候，给我带来一筐鸡蛋，说是让我补补身子。可我怎么能收学生家长的东西呢？我推让了很久，但他硬要我收下，我只好收下了。

这位家长走后，我老觉得不安，便想了个处理这一筐蛋的办法。

第二天课间操时，我用煤油炉子煮了一个鸡蛋，然后，叫来汪斌，把热鸡蛋塞给他：“这是你爸爸托我给你煮的，快趁热吃了！”

于是，我开始每天都定时给汪斌煮一个鸡蛋，一直持续了整整一个月。

后来，有老师知道了这件事，都说我“太爱学生了”，我却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他是我表弟！”

是的，我没有把握我对学生的赤诚能够被所有人理解，相反，那时年轻幼稚的我生怕别人说我“假得很”……

1983年，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。这年春天，我因劳累过度，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，常常连续几夜不能入睡，医生不得不决定让我住院治疗休养。

我本不打算告诉学生，想悄悄离开学校，以免学生们感情受到震动。可临时代我做班主任的冯老师却在她上体育课时告诉了学生们，于是，在离校那天下午我为学生上最后一堂课的时候，教室里哭成了一片！

放学后，许多学生又含泪来到我的宿舍，韩军、李松、张红霞等几个孩子天真地问我联系好医院没有，如果没有的话他们愿意帮我找“最好的医院”。

一批学生走了，又一批学生来了，就像我永远不会再教他们似的。

天色已晚，我的头也有些昏沉沉的，便准备回我母亲家了。可又来了几位女同学：许艳、毛利、黄慧萍、杨红、耿梅。

她们一进屋，就“呜呜”地哭了起来，我一时真不知该怎么劝她们，但也不能让她们这么老哭下去，便用开玩笑的口吻对她们说：“谢谢你们来参加李老师的追悼会！”

她们并没有被我逗笑，不过哭声渐渐小些了。

过了很久，几位同学抽泣着说：“李老师，以前我们惹您生气了，做了对不起您的事。请您原谅！”

我说：“哪儿的话？你们从来没有对不起我，别哭了！你们都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孩子，是我最喜欢的学生！”

谁知听了我的这句话，她们竟又哭得厉害了：“呜呜……是我们把您……气病的……呜呜……”

于是，我装出真的很生气的样子，说：“你们怎么不听李老师的话呢？叫你们别哭，可你们老哭！这才是真对不起李老师！”

她们终于控制住了自己，只有许艳和黄慧萍还在抽抽搭搭的。

我便给她们提希望，鼓励她们在我走后要听冯老师的话，要努力学习……

天已经完全黑了，我对她们说：“你们该回去了，不然会让爸爸妈妈在家里等着着急！”

“李老师，让我们给您唱支歌吧！”许艳擦擦眼泪说道。

另外几个女生也说：“对！李老师，让我们为您唱支歌吧！”

“好！”我同意了，“不过等等，我把录音机打开，把你们的歌声录下来。”

唱什么呢？她们讨论了好一会儿，决定唱“李老师最喜欢听的”《少年，少年，祖国的春天》。

于是，在我的口琴伴奏下，简陋狭小的房间里飘出了世界上最美的歌声：

我们欢乐的笑脸，
比那春天的花朵还要鲜艳；
我们清脆的歌声，
比那百灵鸟还要婉转！
……

我在住院的整整一个月里，每天都在想念学生；学生们也随时在想念我，来看我的学生络绎不绝，使其他病友羡慕不已。4月1日那天早晨，我偷偷地从医院溜了出来，和冯老师一起带着学生去峨眉山玩了整整一天！虽然，晚上回病房时被护士长狠狠批评了一顿：“还是当老师的，这么不听话！”但那天晚上却是我住院以来睡得最好的一夜……

于是，我经常在想：怎样才能报答学生对我的厚爱？

1987年8月31日，是高90级（1）班的新生进校第一天报到的日子。

当天夜里，我刚上床准备入睡，忽听有人敲门。

披衣开门一看，是上午报到时才认识的宁玮。

她神情紧张而急促地对我说：“李老师，周慧病了！”

周慧？我脑子里闪出一张清秀但苍白的脸，忙问：“什么病？”

“不知道。她肚子疼得厉害。”

我一看表：已近十二点。我没有犹豫，马上便跟宁玮来到女生宿舍楼下，几个女生已把周慧扶了出来。

看她弯着腰捂着肚子，显现出十分难受的样子，我决定立即送她到医院。但医院离学校非常远，公共汽车早已停开，只好用自行车送她了。

我估计她要住院，决定让宁玮和我一起去，以便照顾周慧方便些，但宁玮不会骑车。与周慧同寝室的朱建英说她会骑车，要求一起去。我同意了。

于是，我使用自行车搭着周慧来到了医院。

医生一检查，怀疑是阑尾炎，需要住院观察。

住院部在门诊部后面的山顶上，自行车根本没法上去，而此刻的周慧好像更加疼痛难忍了，小声地呻吟着，几乎走不动路了。

怎么办？我一蹲，弯下腰，让朱建英把周慧扶在我的背上。周慧过意不去，想自己走，但我已憋足劲一步一步向山上走去了。

开始还不觉得累，我一边走还一边说些话来安慰周慧。可越往上走山坡越陡，我的腿有些发颤了，大口大口地喘粗气，说话也很吃力了。与此同时，也许是痛得太厉害了，周慧在我背上又呻吟起来。我便和她开玩笑以分散她

的注意力：“周慧啊……你，好会……享受哟！……骑在人民……的头上……作威作福……”走在旁边的朱建英“咯咯”笑了起来，周慧却一言不发，依然趴在我背上，但呻吟声几乎没有了。走了一段路，我又引用臧克家纪念鲁迅的一句诗来逗周慧：“骑在人民……头上的，人民……把他……摔垮！……”

走了大约 10 分钟，我们终于来到住院部。当天夜里，我和朱建英一直在病房里守候着周慧。到后半夜，她昏沉沉地睡了，朱建英也趴在床沿打着盹，而我，却望着输液瓶里的点滴，一直到天明……

一周以后，在周慧出院那天，她在彭山农村的父亲赶来了。这位朴实的汉子给我提了一只肥母鸡来，流着泪硬要我收下：“李老师，您就是我女儿的亲生父亲啊！……”

后来，周慧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。高中毕业前，她回忆起进高中第一天就生病住院的情景，写了一篇作文《在我生病的日子里》：

……李老师背着我慢慢走着，头埋得很低，腰也给压弯了；他不停地喘着粗气，可还和我开玩笑：“骑在人民头上的，人民把他摔垮！”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却在心里默默地接着诗句念着：“给人民作牛马的，人民永远记住他！”

其实，学生对我的爱才真正值得我“永远记住”。

更使我感动的，是我的学生不止一次“爱屋及乌”——因为爱我，进而爱我的家人。1987 年底，我爱人生了孩子后，当时的高 90 级（1）班学生背着我每人从家里拿了一些鸡蛋来，趁我外出开会的时候，送到我爱人的床前。

类似这样的“秘密行动”已不止一次。这里，让我全文引用一篇学生的作文。作者潘芳奕从初一到高三毕业整整六年，我都任她的班主任。这篇文章是 1986 年她读初二时写的，记叙的是那年秋天的事——

秘密行动

“给，这是鸡蛋、苹果，哦！还有橘子……”我小心翼翼地接过一件件慰问品，按捺不住内心的高兴。一边又回过头去瞥了瞥正站在跑道那边和同学们谈话的李老师：他并没有发现我们的行动！我不禁为我们这神不知鬼不觉的行动而感到得意……

前两天，我们发现李老师心情很不好，有时还对同学大动肝火。经我们了解，原来李老师的妹妹因病住院了，病情很重，动了两次手术还不见好转。李老师一天到晚在医院和学校之间来回奔波，还要利用休息时间为我们读小说，晚上还要家访……心情怎么会好呢？

对于李老师，同学们都十分了解和敬重。他为我们操的心远远超过了一般班主任的职责范围。就说最近吧，他妹妹住了院，需要营养，这使本来经济就不宽裕的李老师面临“经济危机”，但他仍然继续为班上购置图书，上周男同学买足球，他又把刚刚收到的一笔稿费捐给了他们。

想到这些，我们心里很不踏实。

于是，一个个小脑袋开始凑在了一起：

“我们自己去看李老师的妹妹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倒是好。可他妹妹住在哪个医院，叫什么名字，我们都不知道。”

大家一阵叹息。

可这个难题还是被我们解决了。我们在同李老师谈话时，有意把话题往他妹妹生病的事上扯，结果李老师无意中说出了他妹妹住在市红十字医院。至于他妹妹的姓名，到时

候再说吧！

我们班委开了一个秘密会议，一致决定：明天学校将在市体育广场开运动会，大家从家里一人拿一个鸡蛋或苹果什么的，凑成慰问品，然后我们中午去医院。放学后，李老师刚离开教室，班长吴涛就对全班同学宣布了这件事。同学们的回答都是那么响亮！

这天早上，我还有些担心：大家可别忘了，或者出什么岔，让李老师发现了。

到了广场，一看吴涛的提兜里，早已有了二十来个鸡蛋，还有一些苹果。一贯调皮捣蛋的谈俊彦出人意料地拿了12个鸡蛋来！陆续来的同学一个个从身上各个部位变戏法似地掏出鸡蛋、水果。我十分感动：同学们对我们的李老师是多么地爱啊！

运动会开始不久，有同学来向班委报告，听说李老师中午放学后也要去医院看他妹妹。我们当机立断：一定要抢在李老师之前到达医院！程桦、杨毅自告奋勇当了“先遣队”。程桦谎称肚子不舒服，要让杨毅陪他上医院，向李老师请了假便提前离开了。他俩一出广场便骑车飞奔去医院，打听李老师妹妹的姓名和病房……

中午李老师一宣布“解散”，同学们就行动了起来。我和吴涛，还有谈俊彦、李毅、韩广州、喻建忠、彭可佳等十几位同学赶在李老师前面，向医院跑去。

进了医院，等候在大门口的程桦、杨毅便带领我们一路跑步进了李老师妹妹的病房。她躺在床上，脸色苍白。看到我们提着东西进来，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十分感动。

“还让你们提东西来看我，怎么感谢你们呢？”她欠起身子不停地谢着，“我哥哥知道不？”

我们忙说：“不知道，你可千万别告诉李老师，不然他会批评我们的。”

我们手忙脚乱地把鸡蛋、水果一股脑儿地放在了床前的桌子上，塞进抽屉里、脸盆里、碗里、杯子里……门口这时已站了好些其它病房的病人，他们都惊讶地看着我们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可我们顾不上这些，时间对我们来说十分珍贵。因为李老师随时都可能进来。我们匆匆放好慰问品，向阿姨说了声“再见，好好养病”，便迎着一双双好奇的目光，一溜烟出了病房。

刚下楼，跑在前面的程桦便慌慌张张跑回来了：“不好！李老师已经进了医院大门！快隐蔽！”我们吓得马上回头躲在旁边一间小房子的后面，大家都蹲着，尽可能地埋着头。我们屏住呼吸，只听见自己的心在紧张地跳着，同时又是那样兴奋，一下子觉得自己真像电影里搞地下工作的情报员。李老师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，他离我们身边走过去了。呀，他竟没有发现我们！

等他的背影远了，我们才一下站了起来舒了一口气，大家雀跃着，一阵风似地冲出了医院，像完成了一项重要使命。这时我的心，像长了翅膀一样，飞向那蓝蓝的天空……

我觉得我的运气好，每教一批学生，他们都对我特别好。比起学生对我的感情，我欠他们的实在太多太多！

我应该也必须还这笔债。

在八十年代，我几乎每年春节都和学生一起度过，几乎每个暑假都和学生一起游山玩水：近的如峨眉山、瓦屋山，远的如重庆歌乐山、云南石林、贵州黄果树瀑布……

如此和学生“泡”在一起，耗费精力不说，的确还很花钱。一些领导和老师都很佩服我：“李镇西简直太爱他的学生了！”我嘴上说：“不过就是玩玩嘛！我喜欢。”心里却说：“我这是在还债啊！”

接手成都玉林中学高95级（1）班时，我刚到成都不久，爱人和女儿还在乐山，我实际上又成了“单身汉”。于是每到周末，我都轮流把一个小组的学生请到我家做客：有时是包饺子，有时是煮火锅，有时也正儿八经地做